

明代南海的对外贸易环境与广东商品性农业爆发的时间

吴建新

(华南农业大学 农史研究室, 广东 广州 510642)

【摘要】文章论述了明代南海对外贸易环境与广东商品性农业爆发的关系。第一部分将明代南海对外贸易环境分为三个阶段,叙述了从海禁时期到隆庆、万历时期的对外贸易环境。并认为隆庆、万历时期的开放海禁为商品性农业的爆发式发展创造了条件。第二部分以嘉靖三十九年成书^①的《广东通志》中记载的农业民俗史料为基础,分析了商品性农业发展的不充分性,认为此前阶段是以稻作为主的农业经济结构,但同时珠江三角洲和潮州平原部分地区商品性农业已经起步并有相当程度的发展。第三部分从广东从粮食出口大省变为缺粮大省的时间、人地关系紧张的时间、社会商业风气转折性改变,论证了万历以后商品性农业爆发的相关特征。结论认为以“万历以后”为广东商品性农业“爆发”的时间节点,较为确切。

【关键词】明朝;外贸环境;南海;商品性农业;广东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8)06-0070-10

Foreign Trade Environment on the South China Sea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Explosion Time of Commercial Agriculture in Guangdong Province

WU Jian-xin

(Research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al History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

Abstract: This thesis, which is composed of three parts, introduc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eign trade environment on the South China Sea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explosion time of commercial agriculture in Guangdong Province. In the first part, foreign trade environment on the South China Sea in the Ming Dynasty is elaborated based on three phases, namely, the period of banning on maritime trade, Longqing Period and Wanli Period. Besides, it is believed that lifting the ban on maritime trade in Longqing Period and Wanli Period created conditions for the explosive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agriculture. In the second part, in line with agricultural historical materials recorded in Guangdong Annals published in the 39th year of Jiajing Period, it is considered that in the previous stage, 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agriculture mainly focused on rice cultivation, but in the meantime, commercial agriculture in plain areas had gained considerable development. In the third part, releva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xplosion of commercial agriculture after Wanli Period were expounded from the time when Guangdong turned from a major grain export province to a province lack of grain, the time when man-earth relationship was intense and the transitional change of social business atmosphere. Lastly,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explosion time node of commercial agriculture in Guangdong

【收稿日期】2018-04-18

【基金项目】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宋元及明代前期珠江三角洲的农业变革与广州城市发展”(16FZS015)

【作者简介】吴建新(1954-),男,华南农业大学农史研究室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农业科技史、华南农业史。

① 嘉靖《广东通志》成书年代,有黄佐三十九年序,嘉靖四十年刻本,本文以黄佐序为成书时间。

Province is the phase after Wanli Period.

Keywords: Ming Dynasty; foreign trade environment; South China Sea; explosion time of commercial agriculture; Guangdong Province

对于明清广东经济社会的研究,多用“明清”合在一起讨论,或“明代中叶以后”,或“嘉靖、万历以后”这类分期不够明晰的字眼。如果需要做比较清晰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有必要将明代、清代分开。对于明代,笔者以为,嘉靖后期以前是一个明显的分界线,嘉靖后期以前是商品性农业未充分发展的时期,只有在万历以后才出现商品性农业的爆发式增长。以下从南海的对外贸易环境和商品性农业之间的关系来说明这一问题。

一、明代南海的对外贸易环境

明代南海对外贸易环境,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①

(1)洪武年至正德年之前,贡舶贸易为主导的时期

明初广州城的商业盛况,一般引孙蕡的《广州歌》作为证据,事实上《广州歌》中所述广州贸易的盛况是元后期的事^②。但朝贡贸易在明洪武初期已经恢复。“洪武初,设于太仓黄渡,寻罢。复设于宁波、泉州、广州。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琉球、占城诸国皆恭顺,任其时至入贡。”只是限制日本贸易,倭寇由是起。以诸番贡使益多,乃置驿于福建、浙江、广东三舶司以馆之^③。孙蕡的学生黎贞在洪武至永乐二年之前写的诗歌可证广州朝贡贸易的盛况:“(广州城)万斛楼船夜渡江”^④，“海船来自帝皇州，十重巨舰橦三重。”^⑤永乐三年“以诸番贡使益多，乃置驿于福建、浙江、广东三舶司以馆之”。广州设怀远驿为番人聚集之地^⑥。

由于明王朝对民间贸易厉行海禁，倭寇骚扰沿海，中国商民从事走私贸易者与之交通。珠江和广东东西两路的沿海岛屿，不少是番舶和中国商船的交易场所。如香山的三灶岛，“正德中南海势家以新会虚税影占，亡命之徒附之，招合瑶壮立为十甲，聚众盗耕。嘉靖二十五年里排赎为己业。已而有钱备者素通番舶，倚强占夺里排，无之何分上下围管业而哄扰今犹未息。有司丈量归官，复为势家占据，号召海寇，大为民害焉”^⑦。

三灶这个案例，其中有本地里排，又有南海势家、本地势家、亡命之徒、瑶、壮族，各种角色成分非常复杂，在各种势力角力下，有司号令不能达，里排制度形同虚设。又“有钱备者素通番舶”，“势家”又“号召海寇”，实际上是招徕走私的武装船只。虽然县志聊聊数语，但显示了在明前期禁民间通番舶的政策背景下，三灶其实又是一个中外走私贸易频繁的地方。类似的还有大小横琴山，“为寇所伏”^⑧，方

① 本文明代广东对外贸易的分期，参考了李龙潜《明代广东对外贸易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见李龙潜：《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70-196页，并参以作者掌握的文献综述之。

② [明]孙蕡《广州歌》末句云：“回首久游歌舞地，西风斜日淡黄昏”，则诗歌作于明初，所述广州繁荣之事在元代后期。孙蕡是元末明初时人，《广州歌》见梁守中点校《南园前五先生诗·南园后五先生诗》，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48-49页。

③ 《明史》卷81《食货·市舶》。

④ [明]黎贞《赠王子敬凯旋》，《黎林坡集》卷1，《续四库全书本》，集部25-427。

⑤ [明]黎贞《江门杜海波吟》，《黎林坡集》卷1，《续四库全书本》，集部25-427。

⑥ 《明史》卷81《食货·市舶》。

⑦ 嘉靖《香山县志》卷8《杂说》，《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415页。

⑧ 嘉靖《香山县志》卷1《山川》，《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302页。

志的“寇”或为海盗,也有不少武装走私的商人。

正德年,市舶贸易开始出现。这是与明朝对外贸易制度的变化有关的。李龙潜认为,正德中,广东守官以无法措办朝廷采办的龙涎香,便放任番舶来粤以增加货源,导致原来的贡舶制度不能照旧维持下去,于是开启了广东省市舶贸易逐步代替贡舶贸易的新阶段^①。

(2) 正德年至嘉靖末年,市舶贸易从出现到海禁开放之前的发展

这段时期仍是海禁为主的对外政策。但民间的对外走私贸易早就开始。广东最早有私商造船出大海的记载是宣德八年^②。此后越来越多。浙江、福建、广东三地的私商相互联系,造大船,汪直、宗满等势力大的商帮船只很大,足迹遍及东西二洋。

明中叶广东商人私通番舶的现象更为普遍。明人霍与瑕说到,香山近海的游鱼洲,本地船民专门接济番货,送货到濠畔街,等运货差不多了,抽分官到时,货物已经所剩无几,官军无可奈何^③。霍与瑕所述之事当在嘉靖后期。其实是不止游鱼洲一地,为番舶停泊之地,因为广东当局放任番舶到来,加上走私猖獗,更多的无人洲岛就成为番舶与私商往来的地方。嘉靖《香山县志》叙述了“不在版图者”的岛屿,实际上是不在图甲制度管理下的香山沿海孤岛,包括文献上常见的走私物品的“游鱼洲”共43个岛屿,方志称这些岛屿“其民皆岛夷也”^④。嘉靖《广东通志》卷十三《山川》亦记载香山洲岛上有“岛夷”。这些“岛夷”可能包括几类人,一是打渔兼走私的疍家,二是沿海番舶上的外国人和走私的外省商人等。如香山有处海岛,“二峰相峙,豪贵率蛋民(广东的水居人群)为寇者千余艘”^⑤就是这种情况。加上广东沿海东西两路,供番舶走私的岛屿就更多。

广东当局对走私商人,时纵时禁。叶照,嘉靖时为广东副使,“广东番舶奸商多窜入岛夷为市。照严下海之禁,海道肃清”^⑥。但地方官放开时,走私就猖獗。市舶的太监与其他在广东采办物资的宦官、不少将、官,也是与番舶交易的走私者之一。弘治二年秦紘奏言:“中官、武将、总镇两广者,率纵私人扰商贾,高居私家,擅理公事,贼杀不辜,交通土官为奸利”^⑦。广东省市舶司等为宦官掌握,广东财政和军费支出严重依赖对外贸易的税收,中官和军将、文职官员上下其手中饱私囊屡禁不止。

葡萄牙人占领澳门之后,澳门也成为对外贸易的场所。刘纘,弘治年巡按广东时,澳门有珠市,“世其业者十人。豪民张敢者先窜名番舶商海外诸国,货直数十万。夤结中人监舶者假以公牒,得捕盗海上,凭借声张甚,因欲吞十人之业,不得,因诬十人为盗,捕置狱中”^⑧。勾结走私者还有武将,“所在恶少与市为狙侏者日繁有徒,甚至官军贾客亦与交通云”^⑨。环珠江口的农民,在灾荒时节,就会造大船出海走私以谋生计。正德嘉靖年间,因为海寇的缘故,海禁之厉行比明初更甚,停止一切对外贸易和封锁沿海港口^⑩。但“官市不开,私市不止,自然之势也”^⑪。海禁时走私以武装商人集团为主。可以说,正德嘉

① 李龙潜:《明代广东对外贸易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载氏著《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第178-179页。

② 李龙潜:《明代广东对外贸易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载氏著《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第179页。

③ 霍与瑕:《上潘大巡广州事宜》,《霍勉斋集》卷11,广州大典本。

④ 嘉靖《香山县志》卷1《山川》,《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第302页。

⑤ 嘉靖《广东通志》卷13《山川》,香港大东图书出版公司,第298页。

⑥ [明]焦竑辑《国朝献征录》,道光《广东通志》卷224,188引。

⑦ 《明史》卷178《食货·市舶》。

⑧ [明]焦竑辑《国朝献征录》,道光《广东通志》卷243、163引。

⑨ [明]林富上疏,[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上卷9。

⑩ 李龙潜:《明代广东对外贸易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载氏著《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第182页。

⑪ 徐文定:《海防迂说》,《明经世文编》卷491。

靖间的民间走私并未停止过。这样,在非海禁时期,抽分制完毕,民间贸易承担了抽分完毕的货物交易,甚至将船上大部分货物走私完才抽丈。在海禁时期,民间贸易完全以走私形式进行。

(3)隆庆元年海禁开放,万历以后对外贸易大发展

嘉靖年间,不断有官员上书要求开放海禁,其中以林富、杨守陈为最。林富说明开禁有四利。杨守陈则说明开禁可使海上无寇。在隆庆元年,批准福建守官徐泽民的建议,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开放海禁,标志着明代对外贸易政策的转变,从此,贡舶贸易日趋衰落,商舶贸易不断发展^①。来广东的番舶日渐增多,特别是在葡萄牙人盘踞的澳门。万历初年是澳门港早期发展的转折时期。葡萄牙人驱逐各国商人,专据澳门,有独占澳门之势;而南洋商人把经营重心重新转移到广州^②。澳门的货物也多经过香山县等地流入广州的市场。大概万历以后,外国商舶被规定在广州举行,每年冬夏两季都举行定期市集,每次开市数星期,有时长达半月,中国商人源源不断地运来各地的货物,使广州成为对外贸易的集散地。澳门的葡萄牙人也要来广州采买物品。广东商船前往东西二洋贸易的也不少。从此开启了广州对外贸易的新局面。关于万历年之后广东对外对内贸易的盛况,记载多矣,李龙潜、叶显恩、谭棣华诸前辈论述甚详,兹不赘。

总的来说,平民参与对外贸易是非常困难的。在隆庆、万历之前,平民造大船出海是被严禁的,如嘉靖十二年、十五年新会民以灾荒生计无着造大船出海,“将为海患”,县官以其非为寇乃为生计,赈济之并毁其船^③。这阻止了民间贸易的发展。只有“势要”掌握了“蛋船”或有武装的商人团伙才能进行走私贸易。明代南海对外贸易的环境,只是在隆庆、万历以后才有较大的改善。

二、嘉靖三十九年以前商品性农业发展的不充分性

明代广东的对外贸易与商品性农业发展的兴起有很大的关联度。明清经济史的论者往往将嘉靖、万历年一起并提为商品性农业的大发展时期。笔者以为,嘉靖、万历两个时段的商品性农业发展程度是有差别的。虽然嘉靖年间对外贸易有所发展,但比不上万历年间。我们以成书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黄佐编撰的《广东通志》卷20《民物志》记载各地的农业民俗来说明这一问题。

(1)广州府

南海和番禺县没有单列,但从对广州城近郊的描述可以看出:“郡城之俗大抵尚文而其东近质,其西过华,其南多贸易之场,而北则荒凉。谚云:东付西俏,南富北贫。”^④城以东为番禺,城以南为南海,城区范围相对二县的乡村范围很小,为了供应广州城市的需要,南海、番禺的城郊型商品化农业还是较为发达的。

顺德:“民性悍好利,岁恒争产盗禾。……(贫民)务农,善渔,工匠日趋于巧。”^⑤“悍好利”说明顺德人商品意识较强,从嘉靖《香山县志》记载顺德民驾大船放鸭于稻田,争夺鸭埠和禾虫埠,说明明代顺德人在商业竞争中具有强争性的特点。当地乡村手工业较发达,陈村等地的园艺业已经兴起,在南顺

① 李龙潜:《明代广东对外贸易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载氏著《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83页。

② 余思伟:《论澳门国际贸易港的兴起与明王朝的管辖》,载明清广东省社会经济研究会主编《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67页。

③ 康熙《新会县志》卷之3《事纪》,《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第40页。

④ 嘉靖《广东通志》卷20《民物志》,香港大东图书出版公司本,第498页。

⑤ 嘉靖《广东通志》卷20《民物志》,第503页。

平原的桑园围等地基塘农业也有较大发展。

东莞,“土尚淳厚。农力稼穡,工不求巧,商能致远。素称易治。地狭赋夥。”^①东莞围田、潮田多,以产稻为主,但甘蔗、荔枝等种植亦盛,莞香已经闻名天下,故云“商能致远”,商品性农业有较程度的发展。

其他县份的商品性农业或不发达或在起步阶段。香山县,“土地卑湿,人多蹶屣,至别其制以别良贱……勤于农圃,而不学工商。”^②说明香山还是以潮田的稻作农业为主。澳门对外贸易的需求并未实质性促进香山商品性农业的发展,以致手工业等需要外县居民进行:“织缝贸贩东莞之民也,耕获版筑新会之民,斧斤木石顺德之民也,皆顾觅为之。”特别富有的人家不太多,“家无百金,取给山海田园”,是一般农民的经济情况^③。新会,“力农者多,贩鬻者少。”^④但新会的葵扇业已经兴起,商贾少说明商品性农业还不太发展。增城,“民先农而后商贾,工仅完足而不求淫巧。”^⑤甘蔗、荔枝的种植未大盛,商业活动也不活跃,手工业不太发达。但部分地区的商品性农业非常突出,如湛若水的家乡沙贝是著名的瓜果之乡。

邻近新会的新宁县,“建县以来,渐向问学……力本者劳,事末者少。”^⑥新宁县流民较多,在山海之间从事开垦和烧炭等。

三水,……读书、农商各守其业,妇女勤于纺织^⑦。三水位于水陆要冲,负担的徭役使本地民负担很重,削弱了农民进行生产活动的积极性。

嘉靖《广东通志》所云郡城“而北则荒凉。”指的就是以下地方:

从化……设县以来,日闻弦诵,甘分耕凿^⑧。但嘉靖年间从化流溪的竹造纸业专业化了。

龙门,读书力耕,不事远贾。妇女力事绩织^⑨

至于位处粤北而属于广州府的清远,“地无旷原沃壤,刀耕火种,最为勤苦,无长溪洪河,肩挑背负最为劳苦。城中男女罕事耕织,商贾工伎皆资异县。”

连州,“人物富庶,商贾阜通……视南方为佳郡……民性类懒,鲜事商贾,病不医药,专务祷神。”阳山,“王民专事渔猎,无商贾屠沽,工匠技艺”^⑩。

(2) 韶州府与南雄府

曲江等地“土旷民稀,流移杂处,俗重耕稼,少商贾。……民不力耕,一岁再熟。闾阎小民取给衣食而已。工无良伎,多售于广城商贾。惟运贩盐钞,往还荆湖,岁月可以致富。至于远乡下里多种绿豆以酿酒。而多惰农,商不富,贾不巨,工不巧,岁时不事游宴。山谷之间有老死不见官府者”^⑪。“六邑多瘠,惟曲江、英德差丰”^⑫。

① 嘉靖《广东通志》卷 20《民物志》,第 503 页。

② 嘉靖《广东通志》卷 20《民物志》,第 503 页。

③ 嘉靖《香山县志》卷 1《风俗》,第 298 页。

④ 嘉靖《广东通志》卷 20《民物志》,第 503 页。

⑤ 嘉靖《广东通志》卷 20《民物志》,第 503 页。

⑥ 嘉靖《广东通志》卷 20《民物志》,第 504 页。

⑦ 嘉靖《广东通志》卷 20《民物志》,第 503 页。

⑧ 嘉靖《广东通志》卷 20《民物志》,第 503 页。

⑨ 嘉靖《广东通志》卷 20《民物志》,第 503 页。

⑩ 嘉靖《广东通志》卷 20《民物志》,第 504 页。

⑪ 嘉靖《广东通志》卷 20《民物志》,第 505 页。

⑫ 嘉靖《广东通志》卷 20《民物志》,第 505 页。

仁化,“在城事商贾,在乡务耕稼。其食粳粘,其衣绵葛。”英德,“壤地沃饶,人民殷足……小人择沃土而耕,而于饶地多不用力。”提到韶州府是“湘韶之通道”,过境贸易发达,如乐昌,“迹日泷路通行,商贾杂处,豪华争夺之风亦渐兴矣。”

南雄府,郡城及乡村大概与韶俗类似“士耻奔竞,贾惮远商,农多卤莽”。

过境贸易也发达:“大庾为往来要冲。俗好逢迎,竞力刀锥之利”^①。

(3) 惠州府

也是以稻作为主。海丰,“先鬼后礼,业儒力稼。”博罗“敦约齐,乐仕进。……民狡谗机械,多嚣讼”(与归善同)。河源,与博罗同,“民趋伪饰”。龙川,“力农习技,略类虔州文物”。长乐,“男不技艺而多力农,女不蚕桑”。和平,“阻山负险,力本遂生者寡。”“惠本南海郡,故其俗亦相近。坊郭多业儒,乡落多耕稼,而实则崇利尚富,秀者游庠序尚文艺……贱农。愚者卖功佣,无别贸易,咸资旅。人坐家操赢取三分息者亦鲜。虽无蓄储,罕见饥馁,亦无千金之家。居室日渐僭侈,而河源丽服。……饮饌多与广城同”^②。

(4) 潮州府

由于地近海边和人口稠密,潮州的商业,“风气大类八闽……,相时竞利,阻山滨海者尤劲悍。……今士矜功名,商竞刀锥,工趋淫巧,农安惰业”^③。(旧志:小民尽力农亩,其次为工,为商,濒海则以鱼盐为业。盖东南地狭人稠,势不能不为工商,濒海多取咸鲜以脩食。三阳之俗大底相同。)由于潮州平原商品经济发达,社会风俗也从质朴转为奢华,潮阳“今渐奢丽”,揭阳“渐趋奢华”^④,潮州三阳地区的商品性农业可以和珠江三角洲媲美。潮州除了稻作发达,“在山谷多林藪园圃之利,土地沃饶”^⑤。

在山区,程乡,“树艺重本薄末,商贾百工皆不能解,远人擅之。”即由于本地工商业不发达,农产品靠外地商贾迁来收购。饶平,“务本勤俭,……山居者善治耕织,近海者治鱼盐,女不蚕桑,男不技艺。然三饶之地,濒海倚山”,大埔,近水者“以末耜舟楫为生,清远之民务本者少,逐末者多。……妇女绩纺,不溺绮罗”^⑥。惠来县农业民俗介于山区与平原之间。

(5) 肇庆府

总的概括是:“土瘠民贫,赋役繁兴。男事渔樵,女勤纺织,仅能自给。故士业诗书,民鲜末技,农力田亩,火耕水耨,食稻与鱼,岁虽二登,粒米亦不狼戾。衣冠文物近会城,乡村则民多椎髻,女多跣足,皆着木屐以避湿气。至康洧一带,夷僚相杂,时有持物出市者。民畏通山之禁,不敢交易。”

高要“涡塘多养鱼苗,南海豪右相与擅利,亦有通山犯禁,与瑶僮交结者,然多江右,南海奸民互相牵诱。”在西江的鱼花捕捞业和本地萌塘鱼稻共作的农业种植很发达。四会,“当二广之交,”^⑦本地人以农为主,而绥水的木材和土产运输和交易很频繁。

阳春,“屋宇编茅,服食俭吝,士不喜儒,民不商贩,男子渔樵,而富家惟事储蓄,妇女纺织蕉葛,造颇精。”阳江,“侨寓多江广之人”,“其俗渔商而盐贩徇利而轻禁货利,器用多资他郡。以故无甚贫、巨富之家。屡经兵燹,文献夷荡。”高明,“分自广肇颇尚礼文。家有税户耕户之分,人有头首细民之别”恩平,“农务耕稼而轻末艺”。德庆,“土地下湿,山岚瘴疠,夷僚相杂”。“其民多尚义而立功名,皆产德

① 以上嘉靖《广东通志》卷 20《民物志》,第 506 页。

② 嘉靖《广东通志》卷 20《民物志》,第 508 页。

③ 嘉靖《广东通志》卷 20《民物志》,第 509 页。

④ 嘉靖《广东通志》卷 20《民物志》,第 510 页。

⑤ 嘉靖《广东通志》卷 20《民物志》,第 509 页。

⑥ 嘉靖《广东通志》卷 20《民物志》,第 509 页。

⑦ 嘉靖《广东通志》卷 20《民物志》,第 511 页。

庆”。泷水,“江滩险恶,商旅罕通,故夷僚杂处……惟务耕畜,不事华靡”。封川,“居诸郡上游,据三江之冲要。习俗荒陋,质朴知义。农少力耕,肆无陶瓦……贫富相当。”

开建,“地广人稀,夷僚杂居”“男子喜习土巫,而耻为工商。”

“民杂于瑶”(婚聘止用牲酒,待客尚巨鱼)。新州、恩平、春州和阳江、泷水,其民“多杂于瑶”^①这些地区还残留刀耕火种农业或火耕水耨的粗放农业。

(6)雷州府和高州府

雷州府“土旷民稀,俗尚简俭,易于取足,耕稼而食,桑麻而衣,务本者多,逐末者少。”“近瑶细民或犯通山之禁。”多习广语。“城东良田靡数千顷,陂塘如绣”,是传统的产粮地。但遂溪,“不勤耕,遂多弃土”,徐闻居民“以渔猎为业。”^②

高州府,信宜“男女并耕”。保留传统的耕作方式。吴川,濒巨海,人多器讼,信巫而谄神。重利而轻义。迨宋以来土多向化。电白,“人力耕”,石城,“力稼穡,贩鬻者寡。”^③

(7)廉州府

“重货轻生,男子不耕,妇女不织不蚕,生计最拙,利鱼盐为生。日用所资,多仰于外至之商。田地不论亩数,买卖惟论禾把多寡。借债展利,自少至多。故富无积金,贫无行丐。”多造荔枝酒。习俗尚鬼徼福。

钦州风俗与廉州相同。干栏,下面是猪,上面住人。灵山,“虽土腴力勤,民不知畜(蓄)岁。”(商人和军家放高利贷)有鱼盐米谷之裕^④。方志描述了不少信巫拜鬼的习俗。

(8)琼州府

概括是:“民皆服布,专务农工,不事商贾。妇女专务纺绩织布为衣被幔帕”,依旧是正德《琼台志》所载:“东路槟榔,西路米”的农业地理景观。东路的琼山、文昌农业较为发达,澄迈民俗似琼山,其余地区稻作之外,以种槟榔、椰子为业。西路较贫穷,如儋州“以射猎为常,不事商贾,以耕织为务。”^⑤大抵近黎族山区的地方都如此。

以上述嘉靖《广东通志》记载各地的农业民俗来看,嘉靖三十九年以前广东还处于以稻作为主的农业经济结构,商品性农业只是在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南海、番禺、东莞、顺德等县,以及在潮州平原近海的三阳地区。全省的商品性农业未达到“爆发”的阶段。

但决不能说,嘉靖三十九年以前的广东农业社会没有发生变化。从宋元到明代前期发生的农业变革而引发的乡村社会变迁,正为即将到来的商品性农业大爆发积蓄力量。不过深入论述这个问题,需要另文。以下只简述作者的观点:(1)社会经济力量积聚:如宋元以来珠江三角洲出现的“富有阶层”^⑥,到明前期力量迅速壮大^⑦。宗族成为村社中普遍的村社制度,宋元不少宗族的族产已经聚集了雄厚的经济力量^⑧,到明代前期积聚的族产更多:乡村中墟市遍布,已经开始出现从自然经济的墟市类型向商

① 以上嘉靖《广东通志》卷20《民物志》,第512页。

② 嘉靖《广东通志》卷20《民物志》,第513页。

③ 嘉靖《广东通志》卷20《民物志》,第513页。

④ 嘉靖《广东通志》卷20《民物志》,第514页-515页。

⑤ 嘉靖《广东通志》卷20《民物志》,第517页-520页。

⑥ 参看吴建新:《从“广米”看宋元珠江三角洲富有阶层的兴起》,《古今农业》2014年第2期。

⑦ 参看吴建新:《从〈琴轩集〉看宋元明前期东江三角洲的大族与精英》,东莞市政协主编:《东莞地方文献整理与东莞学人研究文集》,齐鲁书社,2015年。

⑧ 参看吴建新:《宋元珠江三角洲的农业社会变迁》,《古今农业》2016年第1期。

品交易性的墟市类型过渡^①;对外贸易中的广东商帮初步出现,为大规模的远途商业贸易准备力量^②。(2)思想文化积累。反映在邱浚、湛若水、霍韬等人对商业经济的提倡^③。陈白沙、湛若水、霍韬等人对资生、治生之业的论述,提倡社会上重视民生日用之学^④。(3)社会制度积累。表现为广东的官员在嘉靖末期以前的对赋税徭役制度的改革,为万历年间“一条鞭法”的推行准备了基础^⑤。(4)技术积累。宋元以来发生的农业变革,传统农业技术得到传播^⑥,到明前期又有了进步,为经济作物的大规模种植积累了技术。

三、明代万历年间是“明中叶”商品性农业爆发的时间

以往学者所言嘉靖、万历之间的商品经济大发展,所述事其实大多发生在万历年以后。如《广东新语》中的一段记载:“广州望县。人多务贾与时逐。以香、糖、果、箱、铁器、藤、蜡、番椒、苏木、蒲葵诸货北走豫章、吴、浙,西北走长沙、汉口,其黠者南走澳门。至于红毛、日本、琉球、暹罗斛、吕宋、帆踔二洋。倏忽数千万里。以中国珍丽之物相贸易,获大赢利。农者以拙业力苦利微,辄弃耒耜而从之。”^⑦这是商品性农业爆发性发展时才有的现象,和万历年以后南海对外贸易环境的改善相辅相成。《广东新语》成书于康熙二十六年,一般认为其所述之事,不少可以上溯到明代中叶以后或明末清初。在嘉靖四十年以前的文献中,很难看到与这条记载相类的关于对外贸易和商品性农业关系密切的资料。李龙潜将这一记载年代列为明代隆庆、万历以后^⑧,笔者认为完全正确。《广东新语》这一记载可以从万历《顺德县志》、崇祯《东莞县志》、顺治《南海九江乡志》以及其他方志材料来证实。以往学者论述“明中叶”发生的商品性农业概况,其实大都是万历以后对外贸易放开的时期出现的。笔者不在这里展开对商品性农业的论述,仅讨论万历以后才是商品性农业“爆发”性发展的时间节点。胪列作者的以下观点:

第一,从万历以后广东缺粮的情况,证明由于经济作物的种植排挤了水稻的栽培面积,农业经济结构从以稻作为主变为稻作与经济作物并存的状况。

明代谢肇淛的《五杂俎》尚记载:“江右荆、楚、五岭之间,米贱田多,无人可耕”,“至岭南,则三收

① 李龙潜:《明清时期广东的墟市类型及其特点》,载氏著《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第120-127页;《明清时期广东的墟市的盛衰、营运和租税的征收》,载氏著《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第134-157页。

② 广东商人很早就存在,如吴建新:《宋元广州城的农林鱼盐产品贸易》论述广州城的各种市场(《广州文博》待刊),从侧面说明宋元广东商人的存在。明人文献有所涉及明前期的商业:“自宣、成、弘、德以来,民物殷富,储蓄充盈,雄视他省。舳舻贩舶,篙工健卒,络绎无昼夜”,[明]何维柏《赠采山方公晋太卿序》,《天山草堂存稿》卷四。这一记载从侧面说明明代前期广东商帮的存在。此外,黄启臣等著《明清广东的商人》第41页论述明前期早期牙行。李龙潜等学者的论文亦略有涉及,但论证明前期广东商帮的情况尚需深挖材料专文论述。

③ 参看李龙潜《大学衍义补·序》,载氏著《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第278-282页;李龙潜《评湛若水的社会经济思想》,载氏著《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第270-27页;郑克晟《霍韬的政治主张和经济思想》,载广东历史学会编《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形态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65-169页。

④ 吴建新《明代岭南大儒与资生之术》,2018年1月广东理学心学研讨会论文。仅举一例:理学家并不反对被视作“末业”的商品性农业,如陈献章有东莞茶园弟子袁晖以种莞香为生,白沙赠诗曰:“峡东湾湾一水长,商船无日不苏杭。千村万落无穷树,尽是袁郎柜里香。”(《茶园曲·寄治香柜袁晖》,《陈献章集》,中华书局,1987年,第557页)

⑤ 刘志伟:《明代一条鞭法改革前广东地区赋役制度考述》,载广东历史学会编《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形态研究》,第138-175页。

⑥ 参看吴建新《宋元珠江三角洲的农业社会变迁》,《古今农业》2016年第1期。

⑦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4《食语·谷》,中华书局,1985年,第372页。

⑧ 李龙潜:《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第187页。

矣。斗米十余钱”^①。但这一记载应该是万历以前的事。因为在万历年间,广东对出口粮食严加禁止,粮食供求关系紧张,粮价已经飙升。

万历年间官民都重视加强仓储的通过平糶方式平抑粮价。以人多地少的潮州为例,万历年潮州粮荒,潮州人林熙春有《救荒议》记载:“今米价较往时犹逾矣。往者饥仅一方,今则饥遍数邑;往者米贵数日,今则已贵数月”,建议设立义仓、社仓等储备粮食以救荒^②。岭南人在中古时没有积蓄粮食的习惯,但在嘉靖年在粮食紧张、商品性农业发达的顺德县出现为了救荒的社仓 13 间^③,但在广东还不普遍。社仓、义仓的大量出现是在万历年间^④。

在万历之前,不见广东禁止粮食出口的记载。但在万历年,一方面广东缺粮,另一方面,闽南等地商品性农业亦发展,对广东米的需求比宋代更为殷切。如阳江县“北津为广、琼货舶衙,艚粟输闽,海寇接舳舻”^⑤。粤西的吴川县,本为一个不出名的小县,“万历间,闽、广商船大集,创铺户百千间,舟岁至数百艘,贩谷米、通洋货。吴川小邑耳,年收税饷千万计,遂为六邑最”^⑥。清初屈大均说珠江口,“往者海道通行,虎门无阻,闽中黑艚,盗载谷米者,岁以千余艘计”^⑦。他说的“往者”,正是万历、崇祯间事。明代潮州揭阳县,设“落地税”以限制粳米闽艚,此税“十县所无,而揭独有之,始于明季闽省海船进港市余而设”^⑧。“或云潮(州)之粟多以食闽人”^⑨。是潮州米供应福建的记载。但是福建艚船抢购粮食,被称为“艚寇”,数量巨大,导致广东米贵,当时人记载“闽商涌价,米粒如珠”导致“民大哗”^⑩。以致万历年广东地方当局采取断然措施禁绝福建米船。万历二十一年,广东巡按御史王有功“禁治闽商私粳。闽商白艚至广东辄多买米以私,各岛牙户利其重资,相与为奸,米价辄腾,民哗。有功治商逐艚,民乃定”^⑪。万历二十八、二十九年之间,广东巡按御史亦“严禁白艚以防接济”,命令沿海港口,“严加禁遏,如有前艚,悉令驱逐”^⑫。二十八年,广东“岁入小歉,米价不至翔贵者,禁白艚之力也”。天启四年,巡按御史陈保泰亦以“闽人私粳米,米价腾涌”,“督府捕数人杀之”^⑬。粤东沿海县份亦有遏余措施,如万历年冯渠在海丰县“禁贩舶以救荒”^⑭于嘉忠在澄海“闭漳余”^⑮。对福建米船的禁余,标志着广东作为为余粮省份地位的结束。万历年,广东本地因经济作物发展而引起粮食种植面积减少、非农业人口增多等因素,使它已无多余的粮食可供出口。估计万历二十年以前广东的粮食情况是:丰收之年稍有余裕,小歉之年仅可自给,大歉之年就会饥荒。广东要维持一定数量的储备,用以调剂丰歉之年,地区之间的余缺,并与来自福建的米船作斗争,这一斗争延续到明末。

第二,人口增长超过耕地的增长,人地关系紧张,发生在万历年。

① [明]谢肇淛:《五杂俎》卷 4《地部二》。

② [明]林熙春《救荒议》,《潮州耆旧集》卷 30,香港潮州会馆出版。

③ 嘉靖《广州志》卷 15,广州大典版,第 331 页。

④ 方志钦主编《广东通史(古代下册)》,广东高教出版社,2007 年,第 326-332 页。

⑤ 道光《肇庆府志》卷 3《舆地》引“崇祯”府志,中国地方志丛书本。

⑥ [明]陈舜系:《乱离闻见录》卷上,《明清广东稀见笔记七种》,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5 页。

⑦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 14《食语》。

⑧ 乾隆《揭阳县志》卷之 3《杂税》,广州大典本。

⑨ 万历《粤剑篇》卷 2。

⑩ [明]卢兆龙:《儒休乡义仓小序》,嘉庆《龙山乡志》卷 10“序”,清紫金阁版。

⑪ 道光《广东通志》卷 118《前事略八》。

⑫ 万历《广东通志》卷之 7。

⑬ 民国《东莞县志》卷 31《前事略》,中国地方志丛书本。

⑭ 道光《广东通志》卷 250《人物略》,续修四库全书本。

⑮ [明]王嘉忠:《地方事宜议》,嘉庆《澄海县志》卷 25。

在珠江三角洲人口密集的地区,在万历以前已经出现土地供应紧张的情况,以致坟地亦遭到盗耕。如罗氏明前期祖坟地也遭到开发,“耕灌为园,牛羊上牧”,“越筑基界,斩毁树木”^①。正德年间的东莞茶山,“邑巨乡也……南麓多梅……闾阎生齿之繁(有十三坊),文物之盛,视前又有加焉”^②。明前期广州东郊萝岗钟氏的一支已经蕃衍为八房^③。嘉靖年间香山县沙田区,“多豪右寄庄者,巧立名色,指东谓西,母子相连,则截而夺之,争讼至于杀人”^④。万历年间沙田区人地关系进一步紧张,新会“豪门贵客,迭相争夺”,所以万历年间此地“生息日繁,土地日辟”,达到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地无卓锥”的地步^⑤。类似的例子有南海九江、顺德龙山、龙江这些商品性农业特别发达的市镇。万历年是明代广东人口增加的高峰时期。以下数据可以说明土地的增加情况,以证明人地关系的紧张程度:

明代广东官民田屯田合计表

年代	洪武二十六年	弘治十五年	嘉靖二十一年	万历六年	万历十年	万历二十八年
民田	23734056	25578800	25696800	25686514	32960030	33417071
军屯	685142	685142	685142	685142	796948	796948
田地总数	24419198	26263942	26381942	26371656	33756978	34214019

资料来源:明万历六年以前数字根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347,乙表36;梁方仲333页,乙表29;万历十年数据来自《明实录·神宗实录》卷131;万历二十八年数据来自道光《广东通志》卷161《经政·田赋》。

曹树基对洪武二十四年广东人口的修正数为385.1万人^⑥,洪武二十六年耕地数为23734056亩,则全省人均耕地为6.16亩(军屯数除外)。万历二十八年是全省人口和耕地的最高峰,广东耕地为33417071亩(军屯数除外),广东人口为8489275人,则人均土地为3.94亩。据研究,明初全国耕地400万顷左右,以全国人口7000万左右计,人均耕地5~6亩;万历三十年耕地1225万余顷,以人口1.4亿左右计,人均耕地9亩左右。人口翻了一番,耕地翻了两番,人均耕地增加接近一倍^⑦。明初广东的人均耕地数尚与全国平均数持平,但到了万历二十八年,全省人口增加了2.2倍,但是耕地数只增加了9683015亩,增长率仅为29%,全省人均耕地数不到全国平均数的一半。

人均耕地矛盾尖锐,加上经济作物挤压粮食种植面积的原因,使广东对粮食新作物需求很大。万历年间东莞和电白恰好是中国最早引进番薯的两个地方,并且番薯引进之后推广很快。徐光启《农政全书》已经记载闽粤人在灾荒年以番薯充饥。

第三,嘉靖后期、万历年间社会风气受到商品经济的侵蚀而发生急剧转变,证明以商品性农业为代表的商品经济发展态势蓬勃向上。

新会陈白沙在世时宣传理学,社会风气尚可,后人追述:“薛起蛟曰:吾粤理学始自江门,海内宗之,其流风余韵勿绝也。时士大夫贱荣禄而贵潜修,及门多成德之士,私淑绍统绪之传,散见他郡邑”^⑧。

(下转第134页)

① [明]虞臣:《司勋文集》卷2《上詹宪长论山坟状》,广州大典本别集第9册,第284页。

② 正德七年林光:《重建东岳庙碑记》,《茶山乡志》卷2《庙祠》,第379页。

③ [明]何维柏:《钟氏大祠堂碑记》,同治《番禺县志》卷30《金石略三》,第420页。

④ 嘉靖《香山县志》卷之1《山川》,第304页。

⑤ 万历《新会县志》卷之2《风俗纪》,广州地方志集成本,第91页。

⑥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4卷)明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42页。

⑦ 张显清:《明代后期粮食生产力的提高》,《学术探索》2005年第5期。

⑧ 康熙《新会县志》卷之12《人物》,《日本藏罕见中国地方志丛刊》,第277页。